

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人民性逻辑

乔 榛,张志欣

摘 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一个重要特性,也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梳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这种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体制改革启动和不断深化都基于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以调动人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加以设计,形成改革的不竭动力;三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被赋予新的使命,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赋予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新内容,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以及因此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体制。在建立和推进这一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经济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这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优势得到综合性发挥,但在改革进程中体现出的人民性是实现这一综合效应的内在根据。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应该更加充分地体现这种人民性,继续发挥其具有的独特功能。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性;首创精神;共同富裕

作者简介:乔榛,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150080);张志欣,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 15008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数据要素化对分配结构冲击及调控政策研究”(23BJY016);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政策体系和实现路径研究”(23&ZD069)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5.004

进一步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一个逻辑,也是我国1978年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坚守的一个逻辑,也可以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改革,是我国改革历程贯穿的一个重要线索。理解了这一点,不仅抓住了改革路径的核心,而且也突显了改革成功的密码。我国改革首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突出了要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出发点,也关注到如何调动广大人民积极性的改革着力点。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①我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

① 《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29页。

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内含了非常深刻的人民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②包含了为人民谋幸福和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依然保持了人民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其最重要的价值观,就是始终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③要全面理解我国改革的人民性,可以聚焦经济体制改革历程,能够发现人民性的逻辑贯穿始终。懂得这一点,对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有着特殊的意义。

一、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启动改革历程

我国改革首先聚焦经济体制改革,且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来自顶层的规划,而是农民自发开展的改革。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④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民改变过去被剥削的地位和贫穷的境地。但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和操之过急,我国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⑤人民生活水平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包括“吃饭”等基本生活问题尚未解决,如何实现人民富裕依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农民发挥其首创精神,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下,迈出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步。谈及此,人们自然会想到安徽省的那个小村庄——小岗村。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1978年,小岗村十八户村民通过“约定”的方式,冒着一定风险,将集体土地“分田到户”,开始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创举。

小岗村的改革改变了土地的经营方式。过去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经营,小岗村的改革是在保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通过承包方式让农户获得土地经营权。进行这一改革的底层逻辑就是农民获得土地经营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这正是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所在。改革的实质是对过去发展路径的调整。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对农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土地改革的农村,每家每户都有了自己的土地,形成了广泛的农村小土地私有制,实现了人人有其田的理想目标。然而,这种土地制度安排,满足了农民渴求土地的愿望,也有利于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带来了小农户的风险问题,并潜在着土地进一步集中和贫富分化的可能。这一点在土改完成后的较短时间内就有所体现。为此,自1953年起,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就是土地的集体化。将土地农户私有变成土地集体公有,可以降低农户的经营风险,也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还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必要环节。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解决一些问题而建立的,但在解决了一些问题的同时,还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之后,逐步产生了如吃“大锅饭”和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这些问题不断积累,最终演化为农村经济受挫、农业发展停滞、农民生活得不到根本改善的状况。因此,以改变这种状况为目标的改革就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③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组、白暴力、方凤玲:《人民主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1期,第31—36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被提到日程。怎样的土地制度安排是合适的？理解这一点最深切的是农民，要对农村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最有发言权的是农民。这就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不过，农村改革能否正常地进行，关键在于党和国家支持的程度。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取得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构建方式决定了制度变革必须有党和国家的支持或指导。农村改革是农民首创，但农村改革的程度却是由党和国家引导的。1978年之后的农村改革最终在党和国家对农民首创精神尊重和支持基础上推动和普及。

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是根植于自身“基因”之中的。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屡遭外族入侵和欺凌，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除了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斗争和革命没有植根于人民之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而且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充分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根本上是以符合人民意志为宗旨的，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反复证明一个道理，凡是符合人民意志的革命斗争都会取得重大胜利，凡是不符合人民意志的革命行动都难以取得成功。在这一革命斗争历程中逐步积淀而成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基因。其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中国共产党信奉的历史观，也是中国共产党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的重要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反映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最重要的两个贡献之一，是对社会历史理论的革命性创新，颠覆了之前神学的、唯心的社会历史观，不仅把社会历史进步的因素聚焦到人，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19、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断兴盛，最终建立起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并形成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改变了近代以来不断地变革和革命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举起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旗，通过建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广泛同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革命力量，最终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充分证明，人民群众蕴含了最为强劲的推动社会发展力量，只要能够有效地加以发挥，其形成的社会进步力量无法阻挡，由此也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尊重人民群众并从人民群众中寻找社会发展力量的基因。正是源于此，在领导改革开放时也能够充分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最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形成了被誉为“鱼水”的关系：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只要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能顺利推进并取得重大成果；相反，如果偏离群众路线、脱离群众，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面临挫折。正是这样反复的实践检验，使得中国共产党把人民性作为自己最重要的特征，在历史转折时期，都会首先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寻找可以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方略，实现党的重要历史任务和完成党的重要使命。基于此，在农民自发实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时，选择支持农民改革行动，并自上而下地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更大范围内实施，在更深程度上探索。

事实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实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成功，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为推进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此为起点，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反思这个过程，首先能够看到的是经济体制改革所体现的人民性。

二、激发人民积极性推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之所以要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全是计划经济体制本身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具

有可以克服市场经济体制不足的优势,对其改革,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运行难以满足的一些条件,限制了计划经济体制优势的发挥,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了人们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人们的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就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农民自我激励为出发点的,随着改革向更多领域拓展,特别是进入城市改革后,形成一种能够激发人们生产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变得十分重要。农村改革把土地承包给农户,真正实现了多劳多得,从而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但这并没有形成一种新制度,或者说并没有形成一种新的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农村的土地承包解决了生产的自主权问题,自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是有局限的,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利益增进机制。固然,农民承包土地并取得生产自主权,相较于过去在集体中吃“大锅饭”且没有生产自主权来说,这种改变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增加了粮食产量,解决了农民甚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农民如何致富却不是承包制可以解决的,必须有一种价值实现和增加机制,才可能使农民获得一种可持续的利益实现机制,也为农民致富提供长效机制。就此,马克思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如果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占优势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①这一论述看似与建立农民利益增加长效机制无多大关系,但其中包含的一个道理,即建立一种有利于生产或经营主体追求交换价值的市场机制可以形成长久的利益实现机制。农村的土地承包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并没有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利益实现机制,因此,进一步调动农民积极性,甚至形成一种更具普遍性的利益增长机制,必须建立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化改革。

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这不仅是我国改革的路径,而且包含了市场化改革线索及以此激发人民积极性的效果。首先,农村改革释放出过剩劳动力和过剩农产品,因此推动了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从农户中释放出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民手中也有了多余的农产品,必须有一种机制使农民的这些剩余得到转化并变得更有价值,这种机制就是市场机制。过去我们对农村改革的认识多集中在承包制,但更有意义的是,农村实行承包制催生的市场机制建设。这种市场机制建设,亦或是市场化改革,进一步释放了农民的积极性,形成更加强劲的推动中国改革的力量。其次,城市改革以搞活国有企业为中心,旨在提高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农村改革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城市的经济主体是国有企业,城市改革主要是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的中心任务是调动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这与农村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有着同样的逻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没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也没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原因是它们作为国家计划的一部分只被赋予生产的责任,完成国家按计划下达的任务。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国有企业自然要吃国家的“大锅饭”。在国有企业内部,工人是国家按计划分配的,国有企业并没有用工自主权,其待遇也是按照国家工资制度取得且是固定的,如此又在企业内部形成了“大锅饭”,即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这两个层面的“大锅饭”极大地消解了企业和工人的积极性,长期来看,国有企业及其工人的积极性得不到提升,甚至不断下降,这成为催生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原因。最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建立起调动整个社会积极性的机制。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拓展,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步改变了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形成以创造价值为目标的经济运行新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家如同一个统一的“大工厂”,而企业只不过是这座“大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计划经济时代的这种经济组织体系,决定了调动企业和工人积极性有着比较大的难度。国家计划的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有计划配置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进而提高生产力和加快经济增长。这一目标重要且有意义,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63页。

键在于如何高效地落实这些计划。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用来落实这些计划的手段是在多层次的结构中下达指令性计划。一方面是多层次结构,另一方面引发多层委托代理关系。这使得指令性计划落实面临巨大的交易成本,使计划经济具有的高效率得不到释放并走向反面,成为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根据。在计划经济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中,可以发现的一个最大制约因素便是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难以被激发,极大地消解了计划经济的内在效率。把计划经济体制引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以此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市场经济体制具有一种调动市场经营主体积极性的机制,即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价格机制是市场主体实现其产品价值的引导机制。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市场主体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以期在竞争的市场价格下实现利益最大化。竞争机制是价格机制的延伸,各市场主体围绕价格展开竞争,都争取在一定价格下获得更大优势,甚至期望击败竞争对手以获得某种垄断地位。市场机制内生的这种激励机制是其获得许多国家青睐的重要根据。但是,市场机制具有的这种激励作用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广大工人来说,市场机制在给他们带来生存机会的同时,也带来巨大压力,甚至产生两极分化。因此,市场机制虽然内含了一种激励机制,但并没有普惠性,也不利于调动人民的积极性。我国选择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照搬市场经济体制,而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同时,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努力去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实现了市场机制的激励功能与社会主义的保障功能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新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出来的一种新体制,不仅有自身释放出巨大生产力的证明,而且还有相比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更为成功的证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新篇章。”^①与此相对应,俄罗斯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选择了放弃社会主义制度,按照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标准设计改革目标,结果造成改革受挫,不仅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也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在这一比较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区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注重人民性,实现了人民对改革的认同,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从改革的路径看,我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路径,也被称为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这种改革路径可以保证在任何人的利益不会因改革受损前提下,通过增量改革而使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所增加。因此,我国的渐进式改革实现了一种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我国改革初期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同,就是因为改革产生的这一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是在尽量保证改革利益普惠的前提下推进的。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我国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最终建立了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同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一种新体制,是我国创新性改革的结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向计划经济的对立面市场经济过渡;二是创造一种不同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前一种选择是对立思维导向的结果,所遵循的一个基本逻辑是,既然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改革,那么其前途只能是市场经济体制;后一种选择是中国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现实反映,其内在的逻辑是,既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有利有弊,那么吸收二者有利的一面加以综合,会产生一种更有效率的新体制。我国改革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选择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引进市场机制,创造性地实现了二者融合,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除了中国特殊思维这一因素外,还有其他因素,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5—16页。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通过价格机制使一部分人获得更大收益,但因此也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自然会发挥出遏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趋势的作用。当然,有人会就此提出,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比较大,这不是在否定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本质吗?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对现象的观察,而没有深入到问题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发挥好市场和政府两方面作用,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况,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最终一定要实现共同富裕。这势必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的目标,但其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实现共同富裕赋予经济体制改革新使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体现的人民性成就了一条特殊的改革路径,也成为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人民性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主线是变化的,改革的不同阶段所体现或追求的人民性也有所不同。在改革初期,首先是农村改革,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发挥了农民的自主性,也使广大农民得到实惠,生活水平普遍提升。这是改革体现人民性的初始时期。进入城市改革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城市改革也较好地体现了人民性。搞活国有企业围绕放权让利展开,核心在于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大锅饭”的工人随着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而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按劳分配,从而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这不仅是改革内含的一种机制,而且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改革必须要体现的一个结果。我国改革不同于俄罗斯和东欧各国改革的最大特征是没有放弃社会主义,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推进改革。这种社会主义赋予改革的特征,自然要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是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市场化改革中得到快速实现,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改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态势而变成不断扩大的趋势。由此提出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即这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与改革的人民性是否存在矛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的一系列讲话谈到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例如,在1985年9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①1986年9月的一次答记者问时又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②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此有更加明确和系统的表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③在我国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背景下推进改革和发展经济,不能齐头并进,必须充分发挥各地区、各个人的优势,这可能造成收入差距,但要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状况,要允许这种差距存在,以换得经济快速增长。事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374页。

上,我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方面收入差距在扩大,另一方面经济也在高速增长。然而,这决不能成为常态,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形成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改革的根本遵循,而且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力水平达到较高水平,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规模,共同富裕已经变成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个机制,需要使所有人都富裕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成为改革的中心任务。怎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算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答该问题有多个视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①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也是建设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任务。但是,体现好人民性无疑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标识。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的人民性,其本质就是推动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总的思路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③实现这样的共同富裕,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这些是实现共同富裕要坚持的原则,而要加强共同富裕的实现,必须有经济体制的支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体现更加充分的人民性,一方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另一方面使共同富裕成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探索和创新出来的新体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是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除了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还赋予其诸多重要使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④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两个特征突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自然也强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人民性。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其应有之义是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要更加突出人民性,以其推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得以顺利实现。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毫不动摇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⑤“两个毫不动摇”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方面,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活力问题。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习近平经济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9页。

③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第4页。

④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重要平台,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效率问题。在这两个方面的背后,还要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顺利运行提供更具可持续的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通过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积累了巨量财富,但内需不足成为影响当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突破这一约束,为经济增长注入可持续动力,必须导向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改革,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更加关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持。为此,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机制,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①同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形成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合理调节过高收入的制度体系,^②使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统一,更加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是发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功能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聚焦于共同富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把促进共同富裕内置于它的制度体系中,不仅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贯彻始终,而且把提升经济体制改革的人民性作为新的着力点。

四、总结与启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被称为一个“谜”。对此,尽管有不少探索和解释,但依然可以发现一些新的因素,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其中,贯穿改革全过程的人民性是探索我国改革之“谜”不能忽略的因素。人民性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来说,不仅贯穿始终,而且有着阶段性特征。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农民富有的首创精神以及最高决策层对这种首创精神的尊重。中国农民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也形成了丰富的创新精神。在全国人民期盼改革的形势下,中国农民打响了改革第一枪,只是将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便把压抑了的农民积极性调动起来,实现了农业高速增长,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当然,在这一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并保护农民的首创精神,使农民的首创精神得到充分体现,也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具有了人民性。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个重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积极性以增强经济活力。任何一个经济体,其最大活力都蕴藏在民众之中,若想加快经济发展,必须设法把人们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市场化改革确立了个人的市场经营主体地位,因此赋予个人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利益分配权,形成个人的内在激励机制,成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内在动力。强调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保障了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诸多权利,不仅通过市场机制使人们有了自主权和收益权,而且借助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这些权利,使人民的积极性得以在更长时间保持和增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必须转向为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动力。为此,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突出人民性特征的转型要求被提上日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人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成为增强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市场对不同要素贡献的确认,扩大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甚至形成一种趋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客观原因且释放了一种竞争力,对经济发展有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利,但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不到逆转,最终会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在这样的背景下,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必须使其内含的人民性转向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这成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也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出来的新的人民性。

认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内含的人民性,是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何以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线索。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因此,把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中的人民性特征,对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也具有重要启示。

把人民性贯彻到经济体制改革全过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特征,不仅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还激发了人民的积极性。这成为过去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未来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依然要着重体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对人民性提出新要求,把共同富裕作为人民性的新内涵,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必要选择。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使全体人民过上好日子,也就是共同富裕,因此在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体现这一要求。满足这一要求,不仅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注入新动力,还能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达成的目标注入强劲活力。

[责任编辑 求实]

The Logic of People's Nature in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QIAO Zhen, ZHANG Zhi-xin

Abstract: Promot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centered on the people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nd also reflects the people's nature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Sorting 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this people's nature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e initiation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economic system reform are based on respecting the pioneering spirit of the people; Secondly, economic system reform has always been designed with the starting point of mobilizing people's enthusiasm, forming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reform; Thirdly, further deepen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has been given a new mission, which requires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endow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 with new content that is people's nature, that i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are a completely new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nd promoting this economic system, China's economy has created a development miracle. The reason behind this can be said to be th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ism and market economy. However, the people's nature reflected in the reform process is the inherent basis for achieving this comprehensive effect.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further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more fully reflect the people's nature and continue to play its unique functions.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people's nature, pioneering spirit, common prosperity

当代学者风采

周文,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两大工程(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首席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教育部101计划政治经济学虚拟教研室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近5年出版《经济学中国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等10余部专著,其中多部著作进入国家外译工程,翻译成英文、德文、西班牙文、韩文、土耳其文在70多个国家发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等。获刘诗白经济学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乔榛,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省“六个一批”理论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后备带头人。黑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经济学会副会长。出版《我国收入逆向转移影响分配差距的机制及控制研究》等5部学术著作,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动态》《政治经济学评论》《天津社会科学》《当代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般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决策和重点项目等10余项。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第七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1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5项。

